慶應義塾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Keio Associated Repository of Academic resouces

| | |
|---|---|
| Title | 论《语言地理类型学》的语法观 |
| Sub Title | On the grammatical view of geographical typology of languages |
| Author | 石村, 広(Ishimura, Hiroshi) |
| Publisher | 慶應義塾中国文学会 |
| Publication year | 2017 |
| Jtitle | 慶應義塾中国文学会報 (Bulletin of The Keio Sinological Society). No.1 (2017. ) ,p.157(14)- 170(1) |
| JaLC DOI | |
| Abstract | |
| Notes | |
| Genre |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
| URL | https://koara.lib.keio.ac.jp/xoonips/modules/xoonips/detail.php?koara_id=AA12810295-20170331-0170 |

慶應義塾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KOARA)に掲載されているコンテンツの著作権は、それぞれの著作者、学会または出版社/発行者に帰属し、その権利は著作権法によって保護されています。引用にあたっては、著作権法を遵守してご利用ください。

The copyrights of content available on the KeiO Associated Repository of Academic resources (KOARA) belong to the respective authors, academic societies, or publishers/issuers, and these rights are protected by th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When quoting the content, please follow th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 论《语言地理类型学》的语法观

石　村　　广

## 一、前言

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先生在 1978 年出版的《语言地理类型学》（日文原题：《言语类型地理论》）一书中阐明了汉语由南方（侗台、苗瑶、部分南亚及南岛语言）向北方（阿尔泰语）区域性推移的情况，并提出顺行结构（progressive structure，即核心在前的结构）先于逆行结构（regressive structure，即核心在后的结构）这一看法。据他的观点，现代汉语的形成可归为民族交融与语言接触的历史，即“阿尔泰化（Altaicization）”。他说，汉语的动词短语基本上是顺行结构，即宾语或补语之类修饰动词的成分无论如何都须放在所有动词的后面，而事实上，现代汉语（北方话，特别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中相当多的动词修饰语出现在动词前。至于像“钩破衣服”、“烧短蜡烛”那样的复合结构的成立，许多语法学家都公认是中古以后的事。他用图来表示其结构变化，把它解释为顺行结构向逆行结构统一的一个方面（转引自桥本 1978:51/2008:32）：

因为这种致使结构，确实跟介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中古汉语[1]相呼应，也出现在从顺行结构（南方）向逆行结构（北方）区域性推移的中间阶段的方言里。换言之，汉语南方话还保留着保守的顺行结构基本性质，而从北方话来看，动词后置成分的例子是相当特殊的。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把“钩衣破”类略记为 VOR，即 V 为动词，O 为宾语，R 为结果补语，而“钩破衣”类略记为 VRO。

Chao（1968/2001:13）认为：“除了某些小差别，例如在吴方言和广州方言中把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后边（官话方言里次序相反），某些南方方言中否定式

可能补语的词序稍微不同，等等之外，汉语语法实际上是一致的。”所有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在音韵和词汇两个方面显现出来。这是当时学术界的共识。由于语序的地域性问题比以往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桥本先生的学说给语言类型学带来了巨大影响。他创造的研究业绩千古留名，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他的学说有不少地方跟语言的实际不太相容。这几十年来，语言类型学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动结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为例主张，汉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像桥本先生所述的那种类型转变。

## 二、汉语的语序类型

众所周知，自 Greenberg（1966）以来，语言类型学从语言的形态研究转向了语言的语法类型，尤其是在语序类型方面。汉语学界中较早讨论这一问题的有 Tai（1973）、Li & Thompson（1974/2013）。他们认为把汉语分析为 SOV 语言比较合适，可以解释那些常见于 SOV 型语言的现象。另有一些海外学者则坚持认为汉语是 SVO 语言。依笔者的管见，目前学术界对汉语语言类型的看法基本上是，汉语大体上属于 SVO 型，但不是典型的 SVO 型。如上所述，现代汉语的动结式（VRO 式）则由两个谓语连接而成，这种逆行结构的语序也属于 OV 型语言的。例如：

（1）a. 他刮坏了铁锅。

b. 小妹擦干了眼泪。

补语指向述语动词的受事的这一类就是王力（1958）所谓的“使成式”。关于汉语动结式的形成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但一般认为动结式至迟在魏晋六朝时期已经产生了。根据蒋绍愚、曹广顺主编（2005:306-333）的研究成果，汉语动结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隔开式[(2)]紧缩而来，如：“止子路宿”（《论语・微子》）、“击陈柱国君房死”（《史记・陈涉世家》）。余志鸿（1984）、石毓智、李讷（2001）等不少学者持有类似的看法。二是由汉代并列结构而来，如：“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史记・项羽本纪》）。蒋绍愚（1999）、施春宏（2008）等学者持有类似的看法。显然，桥本的语法观跟第一个见解一致。桥本（1978:46,47）还用别的语法形式来说明“顺行结构向逆行结构统一”的历时演变现象。例如：

（2）［宾格］树吾墓<u>椒</u> → <u>把楸树</u>在我的坟墓上种下

（3）［方位格］吴败越<u>于夫椒</u> → 吴军<u>在夫椒</u>把越军打败了

（4）［比较格］霜叶红<u>于二月花</u> → 霜叶<u>比二月花</u>更红一点

（5）［被动格］劳力者治<u>于人</u> → 劳动的人<u>被别人</u>统治

（6）［夺格］出屋 → 从屋子出来

（7）［向格］子禽问于子贡 → 子禽向子贡发问

在标准的古代汉语里，修饰动词的前置词短语，除因为强调或倒装，都放在动词之后，而现代北方话则都移到了动词前面。这样，汉语的语序类型正是处于由 VO 语言逐渐向 OV 语言演变的过程中。现代汉语尤其是北方话有 SOV 特点，依据主要是“把”字句。他认为这是蒙古、满等北方民族的阿尔泰系语言在汉语中留下的影响。

桥本的调查还发现南北方言在语序上的对立。在南方方言中存在“中心语－修饰语”的语序，如：［粤语］“我畀本书佢先”。在名词的构词上也残存着一些对立，如：［粤语］“人客、菜干、鸡公、牛公、鱼生”等[3]。此外，在汉语中越往南方，单音节性越强，而越往北方，复音节词就越多。就声调来说，南方方言的声调系统比较复杂，辅音系统也比较复杂，而越往北方，声调和辅音系统就越简单。

桥本把上古汉语看做是一种较严格的 VO 型语言，然而 OV 语序在汉语的每个历史阶段都存在着。Greenberg（1966）提出许多语言的共性原则，其中有一些是与“语序和谐”相关的原则。然后，Lehmann（1978）、Hawkins（1983）等人扩展和引申了和谐的范围。Dryer（1992:87）把和谐理论表达为“中心语－修饰语”理论（the Head-Dependent Theory）。他认为，动词类型是中心，而宾语类型是修饰语，也就是说，一对成分 X 和 Y 中，当且仅当 X 是中心语而 Y 是修饰语时，它们采用 XY 顺序的可能性，在 VO 语言中会远超过在 OV 语言中。根据这个蕴含规则，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语序的所有成对的一致的表现可以蕴含相应的 VO 或 OV 语序。本文按照 Dryer（1992, 2003）、金立鑫（2016）的观点用六种测试参项，即 1．VO/OV、2．NA/AN、3．NG/GN、4．NRel/RelN、5．VPP/PPV、6．AuxV/VAux 来看一下上古汉语的语序类型。以下我们举例来具体说明：

1．VO/OV 表示核心动词（verb）和宾语（object）之间的两种语序。一个语言它到底 VO 还是 OV 语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的语序决定了相关的一系列成分的排列顺序。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为 VO，这是不容置疑的。例如：

（8）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左传・隐公三年》）

（9）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2．NA/AN 表示形容词（adjective）和核心名词（noun）之间的两种语序（这里的名词和形容词的关系不包括主谓关系，只限于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在 OV 语言中，A 倾向前置于 N（AN）；在 VO 语言中，A 倾向后置于 N（NA）。

上古汉语一般使用 AN。例如：

（10）交交黄鸟，止于棘。（《诗经・秦风・黄鸟》）

（11）强国请服，弱国入朝。（贾谊《过秦论》）

有些学者认为，形容词的位置在 VO 语言和 OV 语言中几乎很难确定它的基本语序位置，所以形容词与名词之间的相关语序几乎成为一个无用的参项。但在 Hawkins（1983）等提出的“多层蕴含关系”中，形容词的位置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指出，在各种测试参项当中，动宾、旁置词（介词）、领属结构、形容词这四种语序是判断该语言的语序类型的重要因素。

3．NG/GN 表示领有成分（genitive）和核心名词（noun）之间的两种语序：在 OV 语言中，G 倾向前置于 N（GN）；在 VO 语言中，G 倾向后置于 N（NG）。上古汉语一般使用 GN。中间有时以“之”连接。例如：

（12）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13）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史记・刺客列传》）

4．NRel/RelN 表示关系小句（relative clause）和核心名词（noun）之间的两种语序：在 OV 语言中，Rel 倾向前置于 N（RelN）；在 VO 语言中，Rel 倾向后置于 N（NRel）。上古汉语以 RelN 为优势语序。中间有时以“之”连接。例如：

（14）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论语・雍也》）

（15）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虮虱。（《史记・项羽本纪》）

另一方面，在上古汉语中，以“者”字煞尾，将定语置于中心语之后的形式也比较常见。文言的特点是简洁流畅，较长的定语加在中心语之上是不习惯的（杨伯峻 2016：107）。例如：

（16）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7）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史记・平原君列传》）

现代汉语几乎没有像上古汉语那样的定语后置现象，而只有定语前置现象[4]。

5．VPP/PPV 表示旁置词（介词）短语（prepositional/postpositonal phrase）和核心动词（verb）之间的两种语序：在 OV 语言中，PP 倾向前置于 V（PPV）；在 VO 语言中，PP 倾向后置于 V（VPP）。上古汉语多用 VPP（如例 3, 4, 5, 7），但 PPV 也较为常见。例如：

（18）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

（19）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

Dryer（1992, 2003）注意到旁置词短语与动词（PPV/VPP）的相对语序，并且发现旁置词短语是所有参项中与动宾语序的对应关系最紧密的。他的论点是：VO 语序与 VPP 语序和谐；而 OV 语序与 PPV 语序和谐。据他的验证结果，这一条语序和谐原则几乎没有例外。现代汉语对语序共性的偏离（如："在公司上班"）在诸多 VO 语序语言中是相当罕见的[(5)]。根据 Hawkins（1994:257）的统计调查，在世界 336 种语言中，日语、韩国语、蒙古语等有 [[NP P] V] 结构的语言最多，占 48.2%。其次是英语、泰语等有 [V [P NP]] 的语言，占 40.5%。这表示在世界上语序和谐性很高的语言大约占 90%，而现代汉语以 [[P NP] V] 为优势语序，同属汉语的语言非常少见，只占 3.6%。

6．AuxV/VAux 表示主要动词（verb）和助动词（auxiliary verb）之间的两种语序：在 VO 语言中，Aux 前置于 V（AuxV）；在 OV 语言中，Aux 后置于 V（VAux）。上古汉语使用 AuxV，即 VO 型语序。例如：

（20）子路曰："愿闻子之志。"（《论语・公冶长》）

（21）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史记・孙子列传》）

基于上面的情况，我们将在下节对汉语的语序类型加以讨论。

## 三、汉语句法的类型特征

本文认为，汉语句法的特殊性和稳固性特别是在上面的第 4 个和第 5 个参项中显现出来。Dryer（2003:51）指出：

> I will start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Proto-Sino-Tibetan was OV, RelN, and PP-V, and that the RelN and PP-V orders are at least partly a retension of these features from Proto-Sino-Tibetan. Let me focus on two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VO & RelN（VO with prenominal relative clauses）and VO & PP-V（VO with preverbal adpositional phrases）. Language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which were OV & RelN or OV & PP-V and which became VO have apparently also become NRel and V-PP, either simultaneously or shortly after becoming VO. Chinese, however, has apparently retained th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long time.

原文大意是：一般说来，如果由 OV 语序转变为 VO 语序的话，"关系小句－名词、"旁置词短语－动词"两种语序也应该在很短时间内演变成"中心语－修饰语"（即"名词－关系小句、"动词－旁置词短语"）的语序。虽然汉语从古以来以 VO 为优势语序，但它仍保持着这种违背"和谐语序原则"的状态。究其原因在

于原始汉藏语（Proto-Sino-Tibetan）为 OV 型语言。也就是说，这两种“修饰语－中心语”的语序可能是原始汉藏语时期的遗留形式。

事实上，在汉语中 PP-V 这种语序已有长久历史。太田（1984:77）对《论语》的“介宾词组”进行考察。它在句子中的位置有两种：

Ⅰ．介宾词组＋谓语　　于（於）、以、用、自、与、为、无

Ⅱ．谓语＋介宾词组　　于（於）、乎、以

在《论语》中，“谓语＋介宾词组”的数量占优势，用于谓语前边的介词也很发达，据何乐士（1992:253-255）的统计调查，在《左传》中 PPV 语序出现 2228 次，VPP 语序占 3570 次，出现比率为 1:1.6。而在《史记》中这个比率为 1464 次和 469 次，即比率变为 1:0.32，PPV 成为优势语序。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上古汉语一句之中就有 OV 和 VO 两种语序的例子。例如：

（22）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23）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论语・宪问》）

在典型的文言句法中，疑问句、否定句的代词宾语是放在谓语动词前面的。但是，我们在上古汉语书面语里还看到遵守常规的例子。任学良（1987:32,33）指出，典型的文言始终保持疑问句代词宾语、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的结构，口语却相反。宾语前置是文言语法，宾语后置是口语语法。

桥本（1978）注重“把”字句（所谓的处置句），把它用作 SOV 型的最重要的例证。Li & Thompson（1974/2013:132）也认为，从 SVO 到 SOV 的演变过程中，SVO 语言中的动词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格标记，并由此导致 SVO 复杂句（这里指 SV1OV2O 格式）被分化成简单的 SOV，即“S 把 OV”格式。如果我们推断前上古汉语曾经是一种 SOV 语言是正确的，那么，汉语已经在过去的四千或五千年里经历了下面这种循环演变：

| 前上古 | | 上古 | | 现代 |
|---|---|---|---|---|
| SOV | → | SVO | → | SOV |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第一，目前语言类型学家无法证明从 SVO 向 SOV 的演变顺序。北方阿尔泰语系的 OV 语序很大可能对汉语的 OV 语序起到加固作用。但是，我们还不知道现代汉语是否会真正向 SOV 方向演化。刘丹青（2003:102-103）指出：“汉语的 SVO 可能来自汉藏祖语的 SOV，它遗留 SOV 语言的部分特点是可以理解的。用这些特征无法反过来证明汉语现在是 SOV。”如果这个演变过程得以完成，语言类型学的假设或许就要改写[(6)]。第二，如太田（1958:259）所指出的，处置句在古代汉语中也有，是用“以”来代替“把”的。例如：

（24）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

（25）齐侯以许让公。（《左传・隐公十一年》）

（26）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史记・滑稽列传》）

为了使上古汉语的类型特点更为明显，本文试图把它跟泰语、现代汉语（北京官话）、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结构的各部分进行对比[7]。下面是比较结果：

| 测试参项＼语言 | 现代泰语 | 上古汉语 | 现代汉语 | 现代满语 |
|---|---|---|---|---|
| 1．VO / OV | VO | VO/<u>OV</u>[8] | VO/<u>OV</u> | <u>OV</u> |
| 2．NA / AN | NA | <u>AN</u> | <u>AN</u> | <u>AN</u> |
| 3．NG / GN | NG | <u>GN</u> | <u>GN</u> | <u>GN</u> |
| 4．NRel / RelN | NRel | <u>RelN</u>/NRel | <u>RelN</u> | <u>RelN</u> |
| 5．VPP / PPV | VPP | VPP/<u>PPV</u> | <u>PPV</u>/VPP | <u>PPV</u> |
| 6．AuxV / VAux | AuxV | AuxV | AuxV | <u>VAux</u> |

（表中的下划线表示“修饰语－中心语”语序）

语序类型学的研究表明，VO 型语言的语序共性是修饰性成分后置于中心语。东南亚泰语基本上遵守这个原则，我们可以把泰语看成是较典型的 VO 语言。与此相对，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满语是典型的 OV 型语言，修饰性成分前置于中心语。跟现代汉语相比，上古汉语确有 VO 语序优势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它也具有少量的“逆行结构”，也就是说，OV 和 VO 语序在上古时期就已经交融混合。这一现象或许也能说明当时的民族迁徙所带来的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影响（详见金立鑫 2016:9）。

据桥本（1978）的看法，比亲属关系更重要的是跟周围语言的互相影响，和作为其结果的整个结构的区域性推移和历史发展。在汉语史上确实有许多重大变化，如：被字句和把字句的产生、前置词短语从动词后前移至动词前、动补结构的形成和体标记词的产生等。石毓智、李讷（2001）等很多学者试图从这个分析角度来阐明汉语的语言类型的转变过程。对此，本文认为从 VO 到 OV 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上古汉语中的顺行结构现象似乎并没达到他们所说的那个程度。王力（1989:1）指出：“词序的固定是汉语语法稳定性的最突出的一种表现。主语在谓语前面，修饰语在被修饰语前面，动词在宾语前面，数千年如一日。有人分析过甲骨文的语法，发现它的词序和现代汉语的词序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如金立鑫（2016）所说的，汉语从古至今仍保持着不完善的语序类型。汉语句法的本质就在

于此。

## 四、从动结式分析看桥本学说存在的问题

上述观点可以用汉语动结式的分析做旁证。如上所述，VO 语言具备顺向结构，这类语言的动结式一般采用 VOR 式（动词谓语－宾语－结果谓语）。与此相对，现代汉语的动结式必须由两个谓语连接而成：

（27）［英语］John broke the vase into pieces.（约翰打碎了花瓶。）

（28）［泰语］kháw thúp kracòk tɛ̀ɛk.（他打破了玻璃。）

他 打 玻璃 破

（29）［汉语］a. 他刮坏了铁锅。 b.* 他刮铁锅坏了。

例（29a）的汉语句子相当于英语和泰语中的动结式。根据桥本的观点，像例（29b）那样的使成结构，跟介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中古汉语相呼应，也出现在从顺行结构（南方）向逆行结构（北方）区域性推移的中间阶段的方言里[(9)]。桥本的这个看法是可以讨论的。本文要指出三个问题：

第一，汉语和侗台语之间存在一种语法机制上的差异。根据石村（2011）的观点，动结式的致使义是由 V 和 R 结合之后所构成的动宾结构的语序所带来的（也不是 R 本身转换得来的）。就汉语动结式和兼语式的关系而言，致使程度直接反映到句法结构上，就相应地形成了动结式和兼语式这两种不同的语序。致使结构是由具有因果关系的两个事件（event）组成的。比如说，在例（29）的句子中，“他刮铁锅”相当于原因事件，“铁锅坏了”相当于结果事件。第二动词叙述动作对象的变化结果，但是分离式语序在汉语中会造出不合语法的句子，如例（29b）。如果把表示结果事件的这个小句的语序变换一下，那就合乎语法了。致使义的来源就在这里。这一意思可以用石村（2011:78）的图示来表示：

（30）他 刮坏了 铁锅。

↓①因语序的逆转带来的复合化

②词汇性致使意义的获得

上面的合乎语法的句子是由于把“铁锅坏了”这一语序倒过来而形成的。这表示，动结式所构成的动宾结构（即 VR+O 语序）是一种加强致使性的语法形式（上面（30）的①）。VR 结构整体之所以相当于一个致使及物动词，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上面（30）的②）。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带宾语的是 VR 结构整体。

跟动结式相对，兼语式也是后一小句主语与前一小句宾语共指的动词连用结构，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身兼两职的名词是第二动词的动作者（agent）。

就是说，兼语式一般是通过命令来实现间接致使的意义，因此，它所具有的致使性比动结式低。例如：

（31）老师让（叫）他回答那个问题。

按照传统语法的观点，兼语式被理解为第一个动词是表示致使意义的，因为兼语后词语所表示的动作状态是由第一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引起的（朱德熙1982:163）。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汉语的使令动词并不包含第二动词所表示的结果：

（32）老师让他回答那个问题，可是他不肯。

致使句一般包含结果的实现。英语的致使动词（causative verb）遵守这个普通语言学的规律。因此，上述句型在英语使动词本身的词汇语义上是自相矛盾的：

（33）*The teacher had him answer that question, but he refused.

这就意味着，严格地说，汉语兼语式也不能表达致使情景。兼语式对致使的解释，最终还得受语序的制约（这里不包括“使”类动词的致使用法）。就是说，在汉语中致使性强弱的差异，是通过语序的不同来体现的[10]。

要注意的是，同属孤立型语言的侗台语、苗瑶语等语言原本不构成复合谓语[11]。请看下面的壮语（34）和侗语（35）的例句（例子音标上的数字为调类）：[12]

（34）a．kou$^{1}$ ɣat$^{8}$ pjom$^{1}$ tin$^{3}$ lo$^{6}$.（我剪短了头发。）

我 剪 头发 短 了

b．ta$^{4}$po$^{6}$ heu$^{6}$ kou$^{1}$ ɕaɯ$^{3}$ pjak$^{7}$.（父亲叫我煮菜。）

父亲 叫 我 煮 菜

（35）a．jaːu$^{2}$ sət$^{7}$ jaːn$^{2}$ wo$^{1'}$ la$^{4}$.（我扫干净了房间。）

我 扫 屋 干净 了

b．nəi$^{4}$laːu$^{4}$ sin$^{3'}$ŋ̊a$^{2}$ ma$^{1'}$ȶi$^{1}$ əu$^{4}$.（伯母叫你回去吃饭。）

伯母 叫 你 回去 吃 饭

例（34a）和例（35a）的VOR式均是侗台语的固有形式。也就是说，在这些语言中，动结式和兼语式的语序差异跟致使程度问题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个语言事实表明，汉语和侗台语之间存在语法机制上的差异。

第二，动结式的出处不是分离型语序，而是复合谓语。关于动结式的认定问题，学术界仍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目前较为流行的见解是，动结式主要来源于动词并列结构，即“及物动词（Vt）+及物动词（Vt/Vi-t）”[13]。这就相当于本文第二节中所提及的第二个意见。例如：

（36）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左传·成公十三年》）

（37）庄公走出，踰于外墙，射中其股。（《战国策·楚策四》）

（38）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秦始皇本纪》)

（39）秦拔去古文，焚灭《诗》、《书》。(《史记・太史公自序》)

蒋绍愚（1999:330）指出：只有断定这些自动词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构成述宾关系，才能肯定是动结式。根据这一观点，我认为很多学者所举的汉代的“动结式”，实际上都是动词的并列式。他认为，只有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并列式”才能发展成为动结式。施春宏（2008:323-331）也指出，隔开式的出现，只是在不同句法配位方式可能性之间的一种选择。它只能出现在双动共宾的V2自动词化以及使动用法衰弱之后，而不能出现在此前。这也就说明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他动词的自动化、使动用法的衰弱与VRO和VOR同时大量出现的原因。另外，石村广（2016）从历时的角度主张，使动用法并不是消失了，它主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双音化后变成了动结式。古代使动用法和动结式之间虽然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临时性和经常性等的差异，但是它的致使义还是通过语序产生的。并列式的使动用法是属于第二动词的，而动结式的使动用法是属于整个复合结构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使动用法从单音节向双音节演变的先后关系。

第三，有关侗台语族语言的亲属（系属）问题，国内外有不同意见。传统上把侗台语归属于汉藏语系，但由于侗台语族诸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共同词项之间的严格语音对应规律现在还没有找出来，所以这种归属也只是一种假设。另外，美国语言学者Paul K．Benedict（白保罗）1942年发表了一种新假设，认为侗台语不属汉藏语系，而与“加岱语族（Kadai)”（由拉嘉语Laqua、拉绨语Lati、仡佬语Kelao和黎语Li构成）有亲属关系；说它们可以和南岛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联成一个“澳泰语系”（Austro-Thai)。目前，中国学者大多仍旧认为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和汉语都属于汉藏语系，而国外的观点则大多认为侗台语属于台－加岱语系[14]。日本语言学家松本克己（2006:335）明确指出：“有学者主张，被称为‘苗瑶’、‘台－加岱’的各种语言和汉语在系统上属于一个语系。这是把由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共同特点（即借用）和由同源关系而产生的共有特征联系起来一起讨论的。笔者完全不同意这种见解。”

总之，虽然壮语等侗台语和汉语属于所谓的孤立型语言，音节结构和句子构造等语言特点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单纯从造句法的角度来看，侗台语VOR式和汉语VRO式之间并没有桥本所说的那种从顺行结构（南方）向逆行结构（北方）的区域性推移情况。而且上古汉语并列式和后起的动结式是同形异构，“谓语的复合化”这一现象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能看到。这些语言事实跟桥本对汉语的理解是不相容的。

## 五、结语

桥本的语言地理类型学说从大局着眼研究存在于东亚大陆语言中的“纵”和“横”的推移模式。如他自己所说，针对一些个别情况的批评和纠正，并不能够改变他对整个东亚语言结构推移的总体看法。但其落脚点仍是汉语史，以空间推移追溯历时演变，其推移模式不仅针对音韵结构，而且涵盖句法结构与基本词汇，因而该模式是一个完整的汉语史研究模式(李葆嘉 1998:87)。只就句法结构而言，从古至今，汉语一直是 VO 语序和 OV 语序的混合型语言。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修饰语和中心语顺序的差异程度，似乎被不适当地夸大了。汉语没有发生过像桥本所述的那种明显的类型转变。以动结式的分析为例，汉语的典型动结式主要来源于上古汉语的并列式，即复合谓语结构，而且它的致使义是承接古代使动用法的。南方的顺行结构（VOR 式）和北方的逆行结构（VRO 式）乍看起来似乎形成那种语言结构连续体，其实汉语的语法机制跟侗台语等民族语言的迥然不同。我们的结论支持“侗台语、苗瑶语等跟汉语没有同源关系”这一假设。

### 注

（1）郭锡良（2013）认为，中古汉语是南北朝、隋朝、唐朝时期的汉语，它继承上古汉语，后来发展为近代汉语。对于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有资料称为近古汉语）的分界，有众多不同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唐宋时期的归属上。

（2）“隔开式”是梅祖麟（1991）提出的。也有人称之为“新兼语式”、“特殊兼语式”等。

（3）这种逆序修饰现象多见于湘语、客家语、粤语和闽语。丁邦新（2000）指出，“公、婆、娘、牯”等表示动物性别的成分是把表示人际关系的名词用于动物，后面表示性别的字是名词而不是形容词，所以“牛公、牛婆、鸡公、鸡婆”之后有时还可以加上名词词尾“子”。

（4）有学者指出，在前一个动词为“有”（或“没有”）的连动句中，“有”的宾语为抽象名词，第二个动词短语可以变换为这个抽象名词的定语，如：“我们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这种句子可以看作是现代汉语中的特例情况。

（5）旁置词（adposition）分为前置词（preposition）和后置词（postposition）。现代汉语的前置词（即介词）主要是从动词虚化而来的，所以大多数汉语的前置词还保留着动词性。根据刘丹青（2003）的观察，汉语的后置词主要来自方位、身体部位和时间等名词。跟汉语的前置词一样，它也是语法化而来，基本上都还保有方位词的用法。

（6）据 Sun & Givón（1985）的分析，当代普通话口语语料中 OV 结构的比例小于 10%。

（7） 泰语、满语的具体用例分别参照 Iwasaki ＆ Ingkaphirom（2005）、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2007:1978-1987）。

（8） 如果某个语言中成分对 A、B 的语序具有交替形式（AB/BA）且其间存在优势和非优势之别，类型学家通常将标记优势语序的字母大写，标记非优势语序的字母小写。参看吴福祥（2009）。

（9） 桥本（1978:51,52）举出一些可能补语结构的例子，如：[客家话海陆方言]“讲佢唔赢”、[吴语上海方言]“话伊勿过。”很多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可能是因为在使成式发展的前一阶段动词和补语的关系还不是很密切的。

（10） 汉语南方方言尤其是吴方言中仍保留着中古汉语中常见的 VOR 式，如:[宁波话]“压其扁”、[绍兴话]“打伊败”等。这种分离型是不能产的，相对于 VRO 式，其致使性较低，一般用于未然或非现实的语境。参看石村广（2016）。

（11） 中国南方的民族语言（侗台、苗瑶、南亚和南岛）里，动词后宾语和结果补语共现的语序有 VOC、VCO、VOC/VCO 三种类型。吴福祥（2009）证明，VOC 是这些民族语言固有的语序模式，VCO 和 VOC/VCO 则可视为受汉语影响而发生演变或变异的结果。

（12） 壮语和侗语均属侗台语族壮傣语支语言。在壮语的语言资料提供方面，本文得到了广西武鸣壮文学校黄善华、滕明新两位先生的热心指教，特此向他们表示谢意。侗语的例句转引自王均等编（1984:386, 388）。

（13） 在本文中 Vt 表示及物动词（transitive verb）,Vi-t 表示不及物动词（intransitive verb）或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14） 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编《中国语言地图集・少数民族语言卷（第 2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84 页。

## 参考文献

丁邦新 2000 论汉语方言中“中心语－修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方言》第 3 期, 194-197 页。

方松熹 1993《舟山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郭锡良 2013 汉语史的分期问题,《语文研究》第 4 期，1-4 页。

何乐士 1992《史记》语法特点研究,载程湘清主编《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261 页。

蒋绍愚 1999《汉语动结式产生的时代》,《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327-348 页。

蒋绍愚、曹广顺主编 2005《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北京：商务印书馆。

金立鑫 2016 普通话混合语序的类型学证据及其动因,《汉语学习》第 3 期，3-11 页。

李葆嘉 1998《混成与推移 —— 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阐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刘丹青 2003《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陆丙甫、金立鑫主编 2015《语言类型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梅祖麟 1991 从汉语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 —— 兼论中古时期起词的施受关系的中立化，《语言学论丛》第十六辑，112-136 页。
桥本万太郎 1978《言语类型地理论》，东京：弘文堂（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世界图书出版。2008 年）。
任学良 1987 汉语句法结构和逻辑结构的一致性 —— 汉语词序的内在规律研究，《中国语文研究》第 9 期，29-36 页。
施春宏 2008《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石村广 2011《中国语结果构文の研究 —— 动词连续结构の观点から》，东京：白帝社。
——— 2016 动结式的致使意义和使动用法的双音化，《当代语言学》第 3 期，339-353 页。
石毓智、李讷 2001《汉语语法化的历程 —— 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松本克己 2006《世界言语への视座 —— 历史言语学と言语类型学》，东京：三省堂。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 2007《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太田辰夫 1958《中国语历史文法》，东京：江南书院。
——— 1984《古典中国语文法（改订版）》，东京：汲古书院。
王均等 1984《壮侗语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王　力 1958《汉语史稿（中册）》，北京：科学出版社。
——— 1989《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福祥 2009 南方民族语言动宾补语序的演变和变异，《南开语言学刊》第 2 期，59-73 页。
杨伯峻 2016《文言语法》，北京：中华书局。
杨柏峻、何乐士 2001《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上）》（修订本），北京：语文出版社。
余志鸿 1984 论古汉语补语的位移，《语言研究》第 1 期，104-113 页。
朱德熙 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Benedict, Paul K. 1942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4: 576-601.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吕叔湘节译《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
Dryer, Matthew S. 1992 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Language* 68: 81-138.
——— 2003 Word order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from a typ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In G. Thurgood and R.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43-55. New York: Routledge.
Greenberg, Joseph H. 1966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Joseph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73-113. Cambridge: MIT Press. (1st edition, 1963.)

Hawkins, John A. 1983 *Word Order Universa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94 *A Performance Theory of Order and Constitue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wasaki, Shoyichi and Preeya Ingkaphirom 2005 *A Reference Grammar of Tha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hmann, Winfred P. 1978 The great underlying ground-plans. In Winfred P. Lehmann (ed.) *Syntaxtic Typology: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Language*. 3-55.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4 An explanation of word order change SVO → SOV.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2: 201-214. (完权译、吴福祥校，从SVO到SOV语序变化的解释，载吴福祥编《境外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文选》，125-13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

Sun, Chao-Fen and Talmy Givón 1985 On the so-called SOV word order in Mandarin Chinese: a quantified text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Language* 61: 329-351.

Tai, H-Y. James 1973 Chinese as an SOV language. In C. Corum et al. (eds.) *Paper from the Ninth Regional Meeting of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659-67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附　记

本文是2012-14年度日本中央大学共同研究计划项目以及2015-17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科研项目15K02528的研究成果。